

研究报告

2016 年第 126 期

2016.12.30

执笔人：藏波 杨 苒

邮箱：zangbo@icbc.com.cn

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启示

要点

-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 GDP 同比增长 10.7%（其中，第一季度 10.7%，第二季度 10.6%，第三季度 10.7%），连续十一个季度排名各省（区、直辖市）第一。
- 重庆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五大生产要素的共同发力：资本要素方面，表现为依靠政府投资引导资本向边际生产效率高的“十大产业”汇聚；劳动力要素方面，表现为依托 IT 企业的进驻，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土地要素方面，表现为通过“地票”增加新增建设用地供给；技术创新方面，表现为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内产业、资本和市场的有效融合，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制度创新方面，表现为政府声誉主导下对政企关系型契约的重塑。
- 与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相比较，两个城市经济发展均具有高投资、高聚集、高增长的特征，但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的影响日趋明显。同时需注意的是，现阶段重庆经济的增长模式，更多表现出的是“资源-政府型”而非“创新-市场型”。所以，其他地区在借鉴重庆经济增长经验的时候还需去粗取精，切不可生搬硬套地“拿来主义”。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其启示

近几年来,重庆市的经济增长始终处于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的首位。今年前三季度,GDP 同比增长 10.7% (第一季度 10.7%, 第二季度 10.6%, 第三季度 10.7%), 连续十一个季度排名第一。重庆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制造基地,工业依然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前三季度,重庆第二产业增长 11.3%,规模以上工业 39 个行业大类中 33 个保持增长,其中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持续表现亮眼,同比增速均超过 20%,已成为重庆工业增长的主要引擎。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冷暖先行指标的民间投资,也保持高速增长,1-9 月累计同比增速高于全国 9.2 个百分点,投资额高达 6155.32 亿元,占重庆全部投资比重一半以上。重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衍生量价高企的房地产市场,而是始终保持着以 6-7 的房价收入比(易居研究院公布的该项数据在 2013-2015 年分别为 6.8、7 和 6.3)为标识的良性房地产市场。那么,重庆如何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重庆的发展模式是否能被广泛借鉴?本报告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析。

一、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

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总需求和总供给模型)来看,经济增长的四大要素分别为: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创新,但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将制度创新内生,所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制度内生的新经济增长模型逐渐被学者用来替换新古典模型。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表述为:

$$Y=\lambda K^{\alpha}L^{\beta}R^{\gamma}A^{\varepsilon}$$

其中,Y 表示经济增长(或总产出),K 表示资本要素,L 表示劳动力要素,R 表示土地要素,A 表示技术创新; λ 表示制度创新; α 表示资本产出弹性, β 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 γ 为土地产出弹性, ε 为技术进步产出弹性。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对前者进行了具化阐述,即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激发经济主体(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参与市场竞争的热情,



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减少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等组织规则的变革。技术创新则主要表现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变革。

从新经济增长理论可知，一个经济体要实现经济增长，不但需要继续夯实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构成的硬件条件，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和优化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的软环境。本报告拟基于新经济增长模型，从上述五大要素来探析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重庆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资本要素：依靠政府投资引导资本向边际生产效率高的“十大产业”汇聚。2013-2015年，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高速增长。2016年1-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1%，比全国高出11.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重庆2014年开始着力培育的“十大战略新兴产业”，具体为：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材料、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MDI及化工新材料、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这“十大产业”均位列我国年进口商品种类的前50位，国内需求较大，且在边际生产率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投资来源上，重庆政府出资250亿，16个国内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如中国人寿、国开行、中国社保等）出资550亿，共同建立800亿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同时，为配合战略新兴产业的不断壮大，重庆还增加了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方面的投资。图1可知，除2013年上半年之外，2011年7月至2015年底之间，重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势头，而其他直辖市的该项投资在进入2015年之后就进入了下行通道。据2016年上半年的《重庆市上半年统计公报》显示，十大战略新兴产业累计实现产值1291亿元，同比增长36.6%，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7%。其中，生物医药产业贡献最大，同比增长17.7%，其次是环保产业，增长16.3%。可见，重庆的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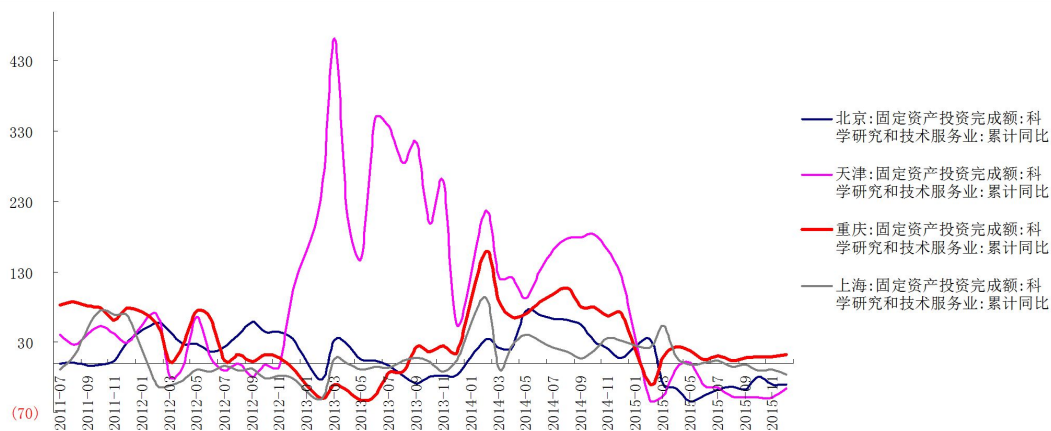


图 1 四大直辖市和全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同比增速

第二，劳动力要素：依托 IT 企业的进驻，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提升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2009 年随着“惠普（重庆）4000 万台电脑生产基地”和“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两个重大 IT 组配项目的入驻，广达、英业达、华硕、宏碁等大型电子产品工业企业也趁势进入，由此形成了年产值 5000 亿（2015 年）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大型劳动力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进入为重庆提供了充足的就业保障，2015 年重庆笔记本电脑企业招工量为 24.6 万人，配套企业招工为 10.5 万人，这意味着 IT 产业拉动了 35 万人的就业，其中重庆农村人口 20.5 万人（基本为一线工人），2016 年该行业预计将拉动 32 万人的就业，其中 19.2 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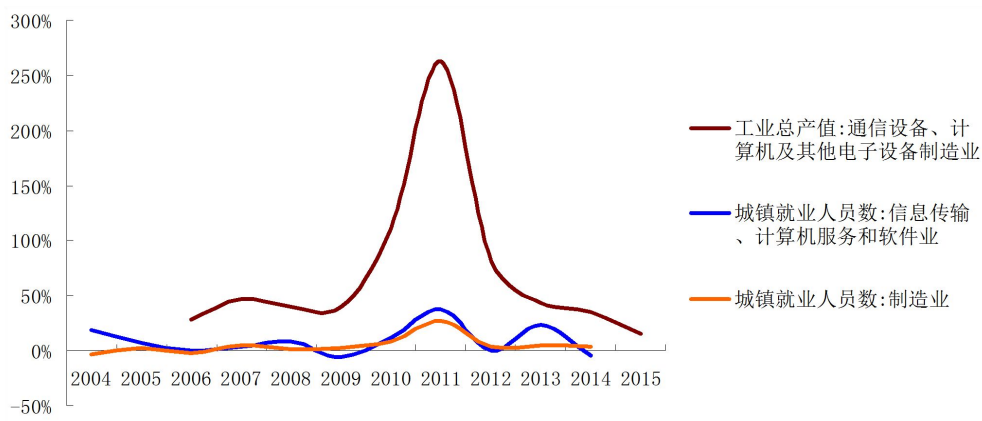


图 2 重庆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增长情况

¹ 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6 年就业创业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



图2可知,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制造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与该产业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长曲线呈现出同步波动的态势,且产值增速平均是就业人数增速的10倍左右。也就是说,产值每提高10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就业。需说明的是,产值增长曲线之所以在2011年表现为波峰,主要源于时滞效应(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产业基地才开始投资建设)。2011年之后,无论是产值增速,还是就业水平增速,均呈现出波动下降的态势。这也说明依靠引入IT产业来拉动就业的效应开始边际递减,但总量仍在持续增加,这有利于规模化的、熟练的产业工人的培养,进而增加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重庆这种以制造业为先导的产业拉动模式,还产生了两方面正向的外部效应:一是有利于增加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总需求,进而提升社会总产出;二是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的联动发展。这里以农村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表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图3),在直辖市序列当中,重庆市的城乡差距在观察时间段的起点,即2013年一季度是最大的,单户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5.35%。但之后该值表现出波动上涨的态势,在2016年三季度达到了近40%(39.89%),季度平均增加0.4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北京、天津和上海的该值均表现为季度平均下降态势,减幅分别为0.18个百分点、0.52个百分点和0.32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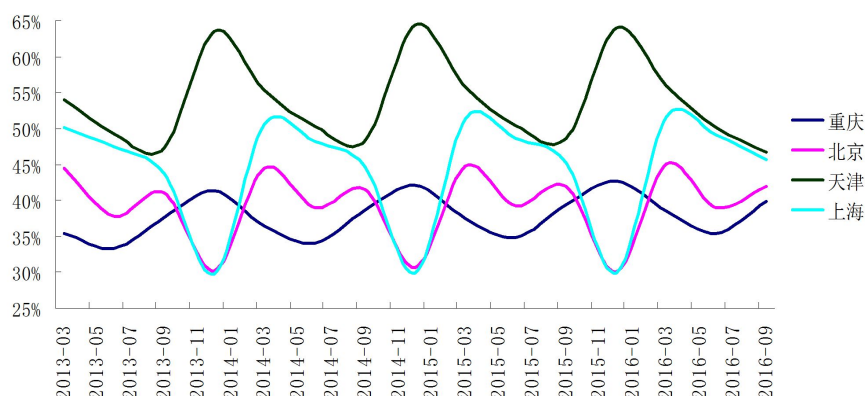


图3 重庆与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第三,土地要素:通过“地票”增加新增建设用地供给。“地票”本质是城乡建

设用地的空间置换指标，即将抵消的农村建设用地（如宅基地及其附着物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性事业用地）复垦为耕地，经由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腾出建设用地指标，由市国土房管部门发给等量面积建设用地指标凭证，后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拍卖，“转移”为城镇建设用地，而这个凭证就是“地票”。这样可带来两方面益处：一是以资本化的方式激活农村沉淀的建设用地资产，使农民享受到了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二是为城市化的推进提供土地要素支撑，从而有利于从供给端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表 1、图 4）。

表 1 2008-2016 年 5 月“地票”的成交情况统计

| | 成交总面积（亩） | 成交总价（万元） | 成交单价（万元/亩） |
|------------|----------|----------|------------|
| 2008 | 1099.5 | 8980 | 8.2 |
| 2009 | 12400.5 | 119924 | 9.7 |
| 2010 | 22200 | 334237 | 15.1 |
| 2011 | 52899 | 1290000 | 24.4 |
| 2012 | 22401 | 466859 | 20.8 |
| 2013 | 131500 | 2672600 | 20.3 |
| 2014 | 151900 | 3064200 | 20.2 |
| 2015 | 172900 | 3456600 | 20.0 |
| 2016 年 5 月 | 177000 | 3534000 | 2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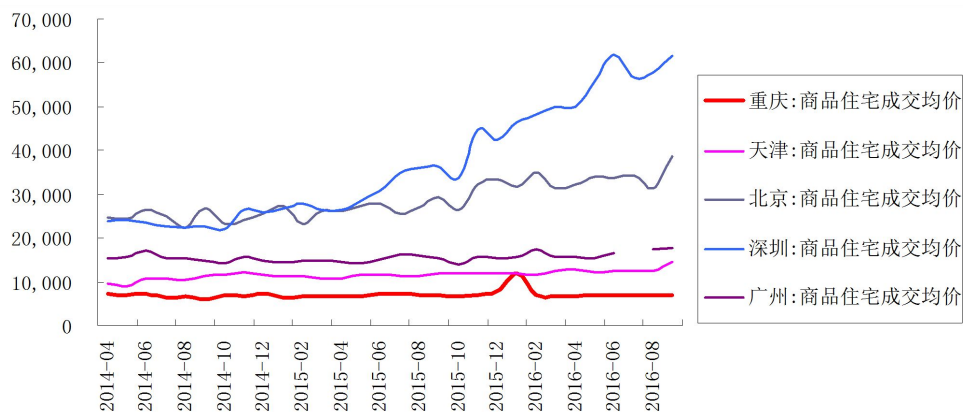


图 4 重庆和一线城市商品房月度成交均价



第四，技术创新：借助国家级新区推动新产业、资本和市场相融合，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快速发展。重庆的“两江新区”是中国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新区，是继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之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重庆在建立和发展“两江新区”的过程中，并没有重复其他工业园区单纯依靠土地和税收优惠来实现招商引资的模式，因为该模式极易产生“土地财政”推高地区商品房价格，以及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负面影响。相反，“两江新区”采取的是以“整机+配套”、“资本+股权”、“资源+项目”、“金融+市场”、“订单+政策”的招商引资模式，将产业、资本和市场相融合。

具体来看，“整机+配套”是通过上中下游产业链集聚，整机企业和零部件企业集聚，最大限度减小内陆地区物流制约。如长安等汽车产业就引入了发动机、变速器、制动系统、转向系统、钢板、轮胎等一大批关键零部件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过了70%。

“资本+股权”指新区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为企业融资。“资源+项目”是新区通过整合全市汽车产业资源，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吸引和外溢效应。如2016年9月，新区就与力帆、小康等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了新能源产业发展公司，以租赁的方式把新能源汽车推向用户，为制造工厂及运营公司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保障。“金融+市场”指新区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发展，通过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平台建设等方式支持产业发展。如设立的2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订单+政策”模式主要针对通用航空产业，新区成立了通航融资租赁公司，让飞机运营出去，既吸引了企业，又解决了产品出路。截至2016年4月末，重庆新增直接融资1060.5亿元，累计发行各类债券1117.8亿元，增长2.6倍，产业引导基金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已累计完成投资180.1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达748.2亿元。

第五，制度创新：政府声誉主导下对政企关系型契约的重塑，进而减少政企关系契约中的道德风险。自2014年开始，重庆便率先在全国以每年大约1300亿元的规模持续推进PPP项目，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水利设施、市政工程、智慧城市等基础设施领域²。以轨道10号线过江通道——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为例，总投资超过30亿，项目建设期为3年，运营期20年，运营期满后移交地方政府，运营期间，投资方

² 重庆计划至2020年，PPP投融资总额达到8000亿规模，接近“十三五”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总额的一半。

将通过收取“影子通行费”、大桥广告经营权、管廊租赁经营权回收成本并获得经营收益。其中，“影子收费”具体指：道路使用者在经过道路或路口时不直接收费，而由政府按其交通流量大小和银行 5 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动态调整，定期（通常为每年）向提供道路投资公司支付使用费。这里交通流量是通过桥梁或道路两端的设备监测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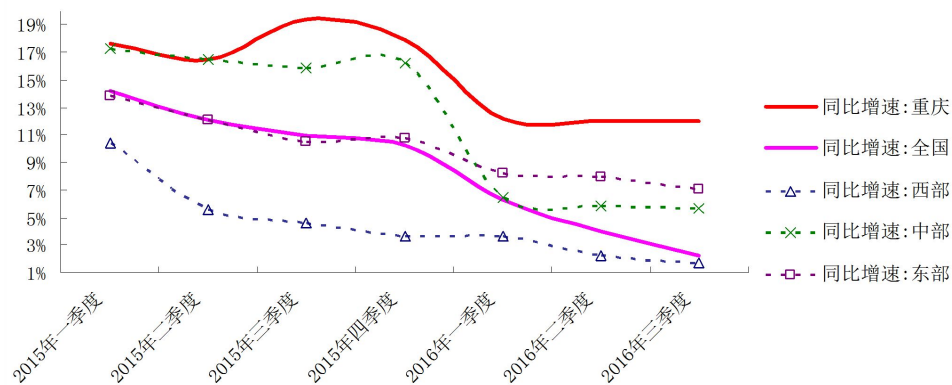


图 5 2015 年一季度~2016 年三季度重庆与不同区域民间投资的同比增速

从具体数据来看，2014 年重点推出 PPP 项目之后，重庆市的民间投资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前三季度均保持了高速增长（图 5）。2015 年一季度，重庆民间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和西部 3.4、7.2 个百分点；而在 2016 年三季度分别扩大至 9.8、10.3 个百分点。需说明的是，2015 年一季度之后，全国进入了“资产荒”时代，能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吸引大量的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重庆的 PPP 模式无疑是极具积极意义和示范效应的。

三、与天津模式的比较：均具有高投资、高聚集、高增长的特征，但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以及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我国区域城市发展模式各具特色（见表 2）。相比较而言，资源驱动型模式适用于工业化初期，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适用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市场主导型模式的经济发展绩效均优于政府推动型；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



因。

表2 各类区域城市发展模式对比

| 模式名称 | 内涵特征 | 东部 | 中部 | 西部 |
|--------|---------------------------|----|----|----|
| 金华模式 | 专业市场导向型 | * | | |
| 温州模式 | 小商品、大市场 | * | | |
| 上海模式 | 政府强势、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 | * | | |
| 深圳模式 | 从出口加工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自主创新模式 | * | | |
| 东莞模式 | 以“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 * | | |
| 苏州模式 | 集体经济向以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的外向型经济模式 | * | | |
| 泉州模式 | 强调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 | * | | |
| 东营模式 | 矿业城市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发展模式 | * | | |
| 天津模式 | 大项目、大投资带动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 | * | | |
| 大连模式 | 提升城市环境，使环境资本变为经济优势的环境经济模式 | * | | |
| 青岛模式 | 以创造知名品牌为城市经济发展提升价值的品牌经济模式 | * | | |
| 鄂尔多斯模式 | 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 | * | |
| 长沙模式 | 两型社会下的城市群协同发展模式 | | * | |
| 重庆模式 | 统筹城乡发展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 | | * |
| 西安模式 | 科技与经济融合的经济模式 | | | * |
| 贵阳模式 | 西部山区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 | | * |

与重庆同为直辖市的天津，由于其地处京津冀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具有更为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发展模式也十分引人注目。总体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九十年代发展开放型经济、本世纪初依靠高水平投资，使天津经济不断跃上新台阶，“十一五”时期的天津GDP年均增速曾达到16.1%。进入“十二五”时期，由于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外部需求持续疲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速开始逐年放缓，2011-2015年增速分别为16.4%、13.8%、12.5%、10.0%和9.3%，下降趋势十分明显。2016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全市生产总值1.33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1%，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排名第4（见表3）。其中，天津滨海新区预计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将突破1万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长13%，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

表3 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省（市区）生产总值对比表（亿元，%）

| 地区 | 总额 | 总额排名 | 增长 | 增长排名 | 地区 | 总额 | 总额排名 | 增长 | 增长排名 |
|----|-----------|------|-----|------|-----|----------|------|-----|------|
| 全国 | 529971.00 | | 6.7 | | 陕西 | 12879.97 | 16 | 7.3 | 21 |
| 广东 | 57061.17 | 1 | 7.3 | 21 | 内蒙古 | 12690.14 | 17 | 7.1 | 23 |
| 江苏 | 55281.46 | 2 | 8.1 | 9 | 江西 | 12587.30 | 18 | 9.1 | 4 |

| | | | | | | | | | |
|----|----------|----|------|----|-----|----------|----|------|----|
| 山东 | 48703.82 | 3 | 7.5 | 15 | 重庆 | 12505.05 | 19 | 10.7 | 1 |
| 浙江 | 32234.33 | 4 | 7.5 | 15 | 广西 | 11345.53 | 20 | 7.0 | 24 |
| 河南 | 28840.57 | 5 | 8.1 | 9 | 云南 | 9536.94 | 21 | 7.6 | 14 |
| 四川 | 23793.60 | 6 | 7.5 | 15 | 吉林 | 9298.11 | 22 | 6.9 | 25 |
| 河北 | 22496.12 | 7 | 6.8 | 26 | 黑龙江 | 9231.60 | 23 | 6.0 | 29 |
| 湖北 | 22198.40 | 8 | 8.1 | 9 | 山西 | 8945.55 | 24 | 4.0 | 30 |
| 湖南 | 21771.08 | 9 | 7.6 | 14 | 贵州 | 8135.38 | 25 | 10.5 | 3 |
| 辽宁 | 19952.81 | 10 | -2.2 | 31 | 新疆 | 6717.79 | 26 | 7.9 | 13 |
| 上海 | 19529.67 | 11 | 6.7 | 27 | 甘肃 | 4769.45 | 27 | 7.5 | 15 |
| 福建 | 18287.01 | 12 | 8.4 | 7 | 海南 | 2880.88 | 28 | 7.4 | 20 |
| 北京 | 17367.77 | 13 | 6.7 | 27 | 宁夏 | 2120.31 | 29 | 8.0 | 12 |
| 安徽 | 17131.95 | 14 | 8.7 | 6 | 青海 | 1741.38 | 30 | 8.2 | 8 |
| 天津 | 13339.44 | 15 | 9.1 | 4 | 西藏 | 829.00 | 31 | 10.7 | 1 |

注：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局网站。

政府主导下高投资、高集聚、高增长的“三高模式”为天津带来了关注度，也撑起了其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第三极”定位的基本框架。天津市逐渐形成以滨海新区为龙头，以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为骨架，通过大项目、大投资带动的重化工业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石油开采加工、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海洋化工为重点的产业集群。2002年，天津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度降至49.71%，但之后的十年间，始终高达50%以上，其中2009年占比高达53.02%，反映出天津经济增长对资源投入和工业制造业的依赖。

2010年之后，面对外需下降和人力资本红利³减弱，天津市在发展路径上加快由要素投入向要素效率和自主创新的转变，提升投资质量和产出效益。突出表现在：

一是产业转型步伐加快。服务业发展增势持续、稳增长作用逐步增强。截至2015年底，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到52.15%，高于工业5.57个百分点。2016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较第二产业增速高出1.4个百分点。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2.9%，对全市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80.2%，占全市投资的70.8%。

二是创新发展成效显著，新的动能不断积聚。2016年前三季度，新增科技型企业

³ 从劳动力资源看，自2009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年减少、比重持续回落，2014年末，全市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回落到61.2%，加之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



1.2 万家，累计达到 8.5 万家。代表新技术发展方向的产品发展良好，生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3.61 万辆，增长 44.5 倍；城市轨道车辆 199 辆；工业机器人 24 套，增长 14.3%；光纤、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长 28.4% 和 19.1%。新兴金融、服务外包、文化创意、“互联网+”等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三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签署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合作协议，打造高端创新要素聚集、产业特色鲜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一流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园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出两批 175 项制度创新举措，投资贸易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前三季度，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增市场主体 9800 户，注册资本 4363 亿元。

但是，天津市转型过程中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匹配。**滨海新区探索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与高投资并行的是优质要素和高端产业集聚，初始落地项目又以资金和技术密集工业项目、新兴产业为主，这一要素禀赋和产业构成决定了其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相对不足。数据显示，2016 年前三季度天津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662 元，同比增长 8.9%，低于 9.1% 的 GDP 增速。**二是房地产市场量价高企。**2016 年三季度天津商品住宅成交 52186 套，同比增长 51.54%，创历年同期新高。其中，一手房创下每小时成交 71 套（按照每天 8 小时工作日计算）的历史纪录。商品住宅成交均价 13208 元/平米，创历年新高，同比涨幅达 14.69%。

从重庆、天津发展模式来看，**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日趋明显。**随着时代的变化，从生产要素来看，各地逐渐步入从依赖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向依赖人才、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转变的新阶段；从制度环境看，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部分作用正在被市场所取代，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从全球态势看，我国参与全球劳动分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技术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形势、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日趋明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出由资源驱动型、政府导向型、内生型的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外生驱动型的模式转变。

四、重庆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与借鉴

第一，政府投资“引导”而非“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在引导经济增长所需要素

投入构成的复合函数当中，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以产业投资为例，若政府的规划投资方向为中长期（如 5-10 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长期位列我国年进口商品种类前 50 位，国内需求较大，且在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那么随着规划投资的落实，政府投资将表现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而重庆的政府投资正是这样一种方式。

第二，以制造业为先导，发挥其在相关产业生命周期内的梯度拉动效应。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将引导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其中，企业部门需求的增加又会进一步增加资源要素的需求，如采矿业和能源产业；家庭部门需求的增加则会产生两方面效应：一是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二是增加制造业本身的需求。所以，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图 6 可知，重庆制造业产值的增加领先于采矿业和公共产品供给行业 1~2 年左右，且制造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均将对后两个行业产值的增加或下降产生“放大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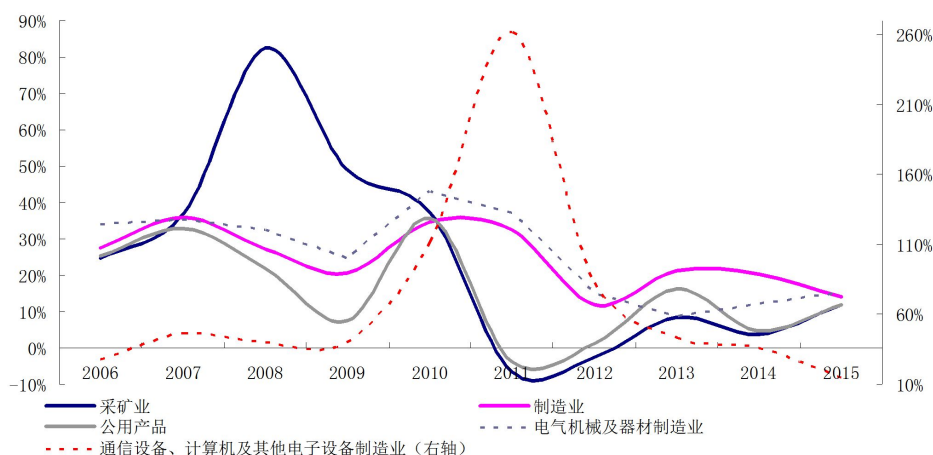


图 6 重庆制造业（通信和电气机械）、采矿业和公共产品加工业的产值增速

图 6 可知，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在制造业发展的生命初期⁴，依赖资源和能源要素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对制造业整体的拉动效应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电气机械行业的产值增长曲线位于制造业之上，且领先于制造业波动；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的电气机械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逐步丧失，在制造业发展的中期，技术创新性产业就成为拉

⁴ 1966 年，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78 年，梅基（S .P. Magee）和罗宾斯（N. T. Robins）提出了行业生命周期“三阶段”理论：要素依赖的初期，技术创新的中期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末期。



动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幸运的是，重庆就是在制造业需要由生命周期初期过渡到中期的时间窗口，引入了技术密集型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计算机等产业产值的增加对制造业产值的增加具有先导效应，其领先于制造业1年左右，但前者需增加约10-15个百分点，才能拉升1个百分点的制造业（图6）。

第三，建立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互惠共生的良性循环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金融创新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撑，但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空转也可能在资金需求层面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图7可知，从增速来看，金融业与制造业的相互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3年3月至2015年3月，重庆金融业的增速始终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期制造业增速也大幅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阶段为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该阶段全国的金融业出现大幅上涨，但制造业增速明显下行，“资产荒”下大量流动性带来的金融空转迹象明显。同期，重庆金融业的增速却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的制造业增速也出现了明显下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庆金融与制造业的强关联度**。第三阶段为2016年年初至今，重庆的金融增速再次显著高于全国水平，且二者差距不断拉大，重庆的制造业增速也相应上扬，**这再次佐证了重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互惠共生的良性循环关系**。同时，我们注意到，在第三阶段，重庆的金融创新呈现出新特征，即积极顺应外向型经济发展对金融结算的需求，大力发展离岸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国公司总部结算、跨境电子商务结算、要素市场结算等五大金融结算业务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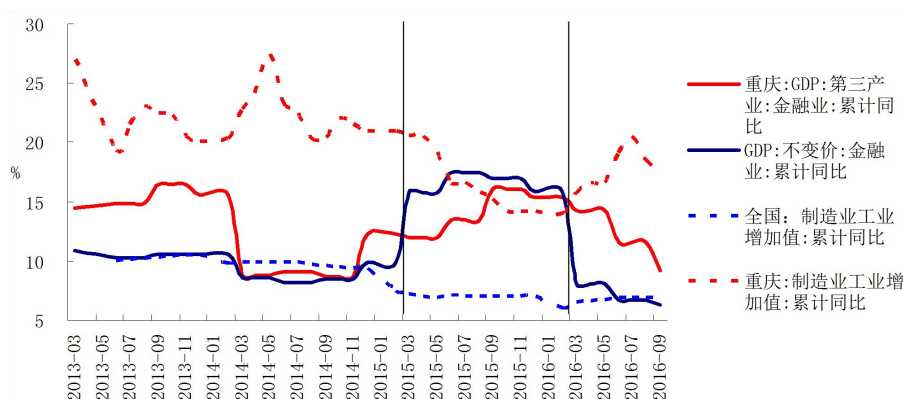


图7 重庆与全国的金融业累计同比增长情况

⁵ 2016年上半年，离岸金融结算累计达4000亿美元。累计引进外资超过100亿美元，外资机构总数126家，其中外资银行17家，位居中西部第一。

此外，为防止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盲目扩张，重庆还推出了“金融风险负面清单”。2016年7月28日，重庆市政府发布了《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要素市场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督促各项要素市场依法合规经营，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明确了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P2P），不得高息揽储、无固定对象乱集资或违规建立资金池等16项负面清单。

第四，依托契约治理结构的创新规避道德风险。在PPP模式当中，民间投资或社会企业最为担心的是政府和企业契约关系上的不对等，其实在PPP模式当中，政府承担委托人的角色，民间投资者承担代理人角色，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下，代理人很容易在项目施工和管理中产生利己动机，若该动机与委托人利益诉求有偏，使得委托人的利益受损，那么损失部分就是该契约关系中的道德风险成本（moral hazard costs）。而重庆独创的“影子收费”操作，其实是政府以支付风险贴水（risk premium）的方式，缩小了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中的道德风险。由于“影子收费”，代理人经济收益是按照桥梁或道路通信量来收取的，建设者势必以保证桥梁或道路通行质量的方式来增加这部分收益，而增加基础设施质量正是政府的利益取向，也就是说，增加“影子收费”将在利益诉求上，形成民间投资（或社会企业）与政府间的激励相容。这种看似政府补贴民间投资者的操作模式，实质上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为保证工程质量，需支付给代理人的风险贴水。

同时需引起注意的是，现阶段重庆经济的增长模式，更多体现出的是“资源-政府型”而非“创新-市场型”，但其正在往通向“创新-市场型”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如政府规划投资带动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目的正是培育规模化和园区化的企业创新环境，以及强化投资的外溢效应。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PPP模式，也是由政府契约关系的约束下，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分享城镇化红利的做法。政府创新的“地票”制度，是将农村居民沉淀的资产资本化的做法，该做法赋予了农村居民更多的城镇化发展红利。所以，其他地区在借鉴重庆经济增长经验的时候还需去粗取精，切不可生搬硬套地“拿来主义”。